

日本文化视域中的

周作人

刘军 著

日本文化视域中的 周作人

刘军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文化视域中的周作人/刘军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321-4076-3

I. ①日… II. ①刘… III. ①周作人(1885~1967)-思想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65132 号

责任编辑: 韩 樱

美术编辑: 王志伟

日本文化视域中的周作人

刘 军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625 插页 5 字数 250,000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076-3/I · 3144 定价: 3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780459

作者简介

刘军，1966 年生于江苏。现任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主任，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日文化比较。1995 年获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硕士学位，2005 年获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学博士学位。2003 年至 2004 年，日本神奈川大学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成果有：《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翻译》（《鲁迅研究月刊》2005 年）、《跨文化与异质语言体验》（《外语研究》2009 年）、《嘉孺子而哀妇人》（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有：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屠杀研究所国家教育部重大科研项目——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006 年）、南京大学 985 二期外国文学研究子项目——日本现代女性作家作品研究（2007 年）、周作人域外文化的接受（上海海洋大学纵向科研项目 2009 年）等。

目 录

序章 周作人与日本

一 周作人和他的日本研究·····	1
二 周作人的读书与工作·····	3
三 周作人的儿童及妇女观·····	4
四 周作人的日本文化研究·····	5
五 日本文学启蒙及排日·····	11
六 中日两国的周作人研究综述·····	12
七 本书之结构及要旨·····	15

第一章 “绍兴时期”的周作人与日本

一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论·····	34
二 浙江五中教员及县教育会会长的工作·····	35
三 大正时期日本的童心主义·····	38
四 周作人“综合性”儿童观及“儿童本位”思想·····	40
五 周作人与日本的书店·····	41
六 周作人的儿歌及童话研究·····	44
七 周作人与安特路朗·····	48
八 周作人的日本儿童文学译介·····	49
九 日本的人情美·····	61

第二章 “五四”时期的周作人与日本

一 从“人的文学”到“儿童的文学”	70
二 M. 韦伯对儒家道德的诠释	72
三 “五四”时期“儿童及人的发现”	74
四 周作人儿童文学论之独特性	75
五 周作人与津田左右吉	78
六 周作人与高岛平三郎	82
七 周作人与江马修	86
八 鲁迅、周作人与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	88
九 周作人与柳田国男	93

第三章 周作人与日本诗歌

一 周作人的日本诗歌译介	106
二 “新诗”及“小诗”运动	108
三 周作人与石川啄木	112
四 周作人与千家元庵	125
五 周作人与小林一茶	130
六 《对于小孩的祈祷》和《西山小品》	136

第四章 周作人女性解放论与日本(之一)

一 周作人与《贞操论》译介	143
二 《新青年》与“女子问题”	148
三 周作人的女性记忆	150
四 周作人早期对于女性问题的关注	152
五 周作人《贞操论》翻译始末	154
六 与谢野晶子《我的贞操观》	157
七 《青鞹》和日本的“贞操”大讨论	160

八 晶子的贞操论——《贞操贵于道德》	164
九 《新青年》“贞操问题”大讨论	167
第五章 周作人女性解放论与日本(之二)	
一 周作人女性性解放论及其原点	178
二 周作人与宫武外骨	182
三 《江戸艺术论》与“东洋人之悲哀”	184
四 周作人与外骨的“猥褻趣味”	187
五 驳《顺天时报》之谬论	193
六 周作人与森欧外	194
附录一 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	209
附录二 周作人与日本([日]木山英雄 刘军译)	232
附录三 新青年时代的周作人与日本(日文)	240
参考文献	287
后记	296

序章 周作人与日本

一 周作人和他的日本研究

关于周作人

周作人于 1885 年(光绪甲申)生于浙江会稽(今绍兴)。从 12 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1901 年,在他 17 岁时,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被分在管轮班。在江南水师学堂学习了 6 年的时间,毕业前,通过了赴日本留学的资格考试,因为近视的缘故被指定学习土木工程。1906 年至日本,初入法政大学后转至立教大学。至 1911 年回国,在日本生活了 6 个年头。民国六年被任命为浙江省教育司的省视学,半年后,回到家乡绍兴担任绍兴第五中学教员。四年后,于 1917 年至北京,受聘于北京大学附属国事编纂处编纂员,半年后,转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发表了许多评论性的文章,还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杰出的小品文作家,他先后发表了《雨天的书》(1925 年)《谈龙集》(1927 年)《谈虎集》(1929 年)《看云集》(1932 年),奠定了他当时在小品文创作领域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

周作人的日本研究

此外,在周作人长达 60 年的创作生涯当中,关于日本问题始终是他最重要的关注点之一。20 世纪 30 年代,在日本研究热潮的推动下,

他更是写了《日本管窥》(1935年)、《日本的衣食住——日本管窥之二》(1935年)、《日本管窥之三》(1936年)、《日本管窥之四》(1937年)等文章。^[1]如周作人自己所说,这些是他写的关于日本的比较正式的研究文章。绍兴时代,他致力于日本儿童问题的研究,译介了关于日本玩具,儿童游戏的相关文章。还撰写了介绍日本俳句、舞蹈、浮世绘的文章,显示了他对于日本问题广泛的兴趣。

“新村运动”

《新青年》时代,周作人是日本“新村运动”在中国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也是日本“新村”北京支部的负责人。1919年7月间,他亲赴日本“新村”本部所在地。在这里,以朝圣般的心情体验到了一种“人类之爱”,回国后,以空前的热情与干劲,到处做报告、写文章,宣传“新村”理想。此外,在此期间,他还撰写了《日本的人情美》(1925年),指出日本国民性的优点,即是富有人情。而在《日本与中国》(1928年)中,他强调指出,中国在其特殊的地位上,特别有了解日本之必要与可能,承认日本文化在艺术与生活上的独特性。与此同时,在20年代国内排日高潮的推动下,周作人写下了诸多针砭日本的激愤之文。如有质问中日文化事业委员会为何还不解散的文章,甚至还有《排日——日本是中国之仇敌》这样近似讨伐檄文式的文章。其他还有针对日本“支那通”和中国“亲日派”所发表的议论。

沦为汉奸

1938年,周作人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在北京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标志着他附逆投敌的开始。第二年即1939年8月,周作人就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1942年,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一步步堕入汉奸的深渊。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在北京,包括周作人在内的共250名汉奸被逮捕,其中12人于次年被移

送南京。经南京国民党高等法院公开审理,周作人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1949年,南京解放,周作人被提前释放。解放后,他沈潜于古希腊文学以及日本古典文学的翻译,还撰写了回忆鲁迅的一系列文章。1967年辞世,享年83岁。

二 周作人的读书与工作

在周作人毁誉参半的一生中,他所从事的工作,可谓种类繁多,涉及的范围非常之广。他在写于1930年的《周作人自述》中,曾这样描述自己:“他原是水师出身,自己知道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关于歌谣、童话、神话、民俗的搜寻、东欧日本希腊文艺的移译,都高兴来帮一手,但这要在真是缺少人工的时候才行,如各门已有了专攻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来,另去做扫地砍柴的勾当去了。因为无专门,所以不求学,但喜欢读杂书,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点事情而已。所读书中,于他最有影响的是英国蔼理斯的著作。”(《周作人文类编·八十心情》1页)在他附于自述后的“补注”中,他特意加上一句,“如不懂弗洛伊特派(今译弗洛伊德)的儿童心理,批评他的思想态度,无论怎么说,全无处,全是徒劳。”(同上)

从江南水师学堂到留学日本,周作人对欧洲(特别是东欧)及日本的各种书籍广有涉猎,可谓一位真正的读书家。通过阅读各类书籍,培养了他宽阔的视野及观察事物科学的态度。具体而言,他不但精通多种外语(古希腊语、英语、日语),还对生物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有所研究,其中对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情有独钟。之所以如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并非是为了学问,而是因为对人本身的兴趣,人是文化起源和发展的主要对象之故。周作人认为,科学是反对封建迷信,从事文化启蒙的最便捷的工具,要培养出新的人,非科学莫属。他在批评中国的

封建陋习和伦理道德时,同样诉之于科学,用科学去检验封建道德的荒唐无稽。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其根源也是科学精神。换句话说,在周作人那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最基本的欲望是人类天性最直接的体现,是人类的自然属性。和其他物质所具有的自然属性一样,人类的自然属性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对人类的的天性加以抑制和束缚是残忍的非人道行为。

三 周作人的儿童及妇女观

儿童及女性本位主义

基于以上观点,周作人感到在中国社会,受压抑最深的当属女性和儿童。因此,周作人对于女性和儿童寄予了极大地同情,对于女性和儿童所发的议论也最多。他主张培养儿童应该随他们的天性,要用科学知识引导儿童天真幼稚的心灵。关于女性问题的主张,最能体现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思想,虽历经了思想上的变化,他对于女性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周作人对于女性问题的思考,与其说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倒不如说是出于他对女性遭遇的切身感受。他首先承认,女性和男性一样,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若能依了女子的本性使她平匀发展,不但既合天理,亦顺人情,而两性间的有些麻烦问题也可以省去了。”(《北沟沿通信》,《谈虎集》298页)。他主张在两性关系中,应该采取“女性本位主义”,他甚至认为“一民族文化程度之高下,既可以道德律的宽严简繁测定之,而性道德之解放与否犹是为标准,至于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常识的完备,趣味的高尚,因是而理知与感情均进于清明纯洁之域。中国号称礼教之邦,而夷考其实,社会上所主张的道德多是以传统迷信为根基的过去的遗物。”(《论做鸡蛋糕》,《谈虎集》268页)。他的这些主张,难免会与道学家的伪道德发生冲突。周作人提倡女性解放的出发点在

于人的个性解放,而在论及关于女性解放问题时,他已经摆脱了仅仅从个性解放看待该问题的束缚,而是将其诉之于社会变革。1918年,他介绍了英国社会学家凯本德(Edward carperter)的《爱的成年》一书,引述书中关于两性问题的诸多论述后,感慨地写道:“女子解放问题,久经世界识者讨论,认为必要;实行这事,必须以女子经济独立为基础。”(《爱的成年》,《谈虎集》154页)他转引凯本德书中第四章“如无社会上的大改革,女子的解放,也不能完成。如不把我们商贩制度——将人类的力作,人类的爱情,去交易卖买的制度,——完全去掉,别定出一种新理想新习俗时,女子不能得到真的自由。”(同上)一段,认为凯本德的话说得最好。后来,周作人在女性解放中加入了女性性解放的内容,明确指出,相比经济解放,女性性的解放更难。

四 周作人的日本文化研究

日本文化研究第一人

本书的着眼点是论述周作人对于日本文化的接受,特别是他的儿童文学论及妇女论所受日本的影响。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整体上把握周作人与日本文化之关系。

可以说,在中国的“知日派”中,很少有人像周作人那样,对于日本文化的理解如此精深。他所理解的日本文化,深入到了日本人的感性深处。而且,在中国近代文学家,也很少见到像周作人那样,不厌其烦、喋喋不休地谈论日本、谈论日本文化,他所论及的领域,涵盖日本文化的诸多层面,可谓衣食住行无所不包。

1935年,和周作人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日本文学研究学者钱稻孙在题为《北平日本文化研究现状》的演讲中,称周作人是“日本文化研究第一人”,可见周作人在该领域的影响力之巨。然而,被称作日本文

化研究第一人的周作人,若是从正统的学术角度看,却并非一个专业的日本研究学者。他虽然翻译出版了《现代日本小说集》(商务印书馆1923年),但却没有一部系统研究日本文学的书籍。在北京大学日本文学系任职期间,他曾计划编写《日本文学史》,可惜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因此,在寻找周作人与日本文化关系的线索时,笔者不得不从他的诸多随笔和散文中寻觅。如前所述,从《日本管窥》四篇以及他的回忆录、书信及各种随笔集中关于日本的议论文章中,可以勾勒出周作人日本文化论的大致轮廓。

在论述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接受时,笔者认为有必要考虑以下两个因素。其一是1906年至1911年周作人的日本留学体验,即他的“个人事件”;其次是他所写日本文化论时的中日关系、时代及历史条件,即“时代事件”。

从个人条件来说,从1906年开始到1911年回国,在东京生活的六年间,无论是衣食住行,他过着完全日本式的生活。“他学习日语,英语和古希腊语。东京生活中的一切,日本文化的简约、细致,还有日本人的人情美等,和他的性情相互交融,培养了他对日本的喜爱与迷恋。”(佐伯彰一、芳贺彻编《外国人日本论名著》,中央公论社,99页)

1936年,周作人在他的《怀东京》一文中,曾这样来表达他的“东京怀念”。“我的东京怀念差不多即是对于日本的一切观察的基本,因为除了东京之外我不知道日本的生活,文学美术中最感兴趣的也是东京前身的江户时代之一部分。我喜欢在东京的日本生活,此外是买新书旧书的快乐,在日本桥神田本乡一代的新旧各店杂志摊夜店,日夜巡阅,不知疲倦。”(《瓜豆集》60页)周作人用两句话归纳他对于东京的“爱着”,那就是“个人之性情,思古之幽情”(同上)。

在《东京的书店》(怀东京之二)中,他不厌其烦地介绍了东京的丸善书店及相模屋书店。在丸善书店中,他购得了霭理斯的《性心理之研究》,这是周作人关于性学研究的启蒙书籍。他说:“使我读了之后眼上

的鳞片倏忽落下,对于人生与社会成立了一种见解。”(《瓜豆集》70 页)

娶日本女性为妻

在论及影响周作人日本文化论的“个人事件”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他的娶日本女性为妻。1909 年 8 月,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至信子 1962 年 4 月去世,两人共同度过了五十余年的岁月。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对周作人娶日本女人为妻这一事实,曾作过这样的评论:“对于周作人的终身大事,可惜我们仅能郑重地写上一句:喜欢谈论自己的周作人,对自己的婚姻,却没有留下一个字,我们也不便多做臆测,只能暂付厥如。”(《周作人传》144 页)钱先生所说的“没有留下一个字”的判断,似乎有些牵强。从周作人自日本归来不久所写日记中,可以窥见他对于分娩及病中的信子悉心照顾的内容,两人之间的和睦之情可见一斑。晚年的信子,患有歇斯底里症,每每发作时,就会对周作人肆意谩骂。1962 年 4 月 6 日,信子病发,被送往北大医院急救。在当天的日记中,周作人写道:“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无寂寞之感。五十余年的情感尚未为恶置所消失,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周作人年谱》891 页)信子于 4 月 8 日在北大医院病故。在周作人 1963 年 2 月 19 日的日记中,写有“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情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弟兄皆多妻,遂多猜疑;以为甲戌东游时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及今思之,皆成过去,特加说明,并志感慨云尔。”(同上 899 页)而 1963 年 4 月 8 日的日记中,记有:“今日为信子周年忌辰,忆戊申(1908)年初次见到信子,亦是 4 月 8 日也。”(同上 900 页)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周作人在失去信子后所感受到的落寞和凄凉,而从“五十余年的情感尚未为恶置所消失”及“素无反目情事”等内容也不难断定,二人之间的感情是很深厚的。笔者认为,对于发生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的周氏兄弟失和及 30 年代周作人沦为汉奸这两大事件中,信子所应承担的责任,

也许并非如常人推测的那么重大。关于周作人与信子,与其从政治层面去思考,倒不如从人情方面去考虑更为妥当。换句话说,正因为周作人娶日妇为妻,使他通过与日本人的近距离接触,更加深入理解日本文化成为可能。

明治维新与日俄战争

另一方面,从当时周作人所生活的时代来看,他留学日本时,正是日俄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与在日俄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对于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那时日本曾经给我们多大的影响,这共有两件事,一是明治维新,一是日俄战争,当时中国知识阶级最深切的感到本国的危机,第一忧虑的是如何救国,可以免于西洋各国的侵略,所以见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发见了变法自强的道路,非常兴奋,见了对俄的胜利,又增加了不少勇气,觉得抵御西洋,保全东亚,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派留学生去日本,其用意差不多就在于此。”(《留学的回忆》,《日本管窥》97页)另外,周作人留学日本时,也是中日关系处于比较稳定的时期。以他自己的体验看,留学东京的6年,“是过得颇为愉快的,既然没有遇见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辱,或有更大的国际事件,如鲁迅所碰到的日俄战争杀中国侦探的刺激,而且最初的几年差不多对外交涉都是由鲁迅替我代办的,所以更是平稳无事。这是我对于日本生活所以印象很好的理由了。”(《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20页)

独特的日本文化体验方式

周作人对于日本文化的兴趣,源于他对于东京生活的热爱及以东京生活为背景的江户时代的文艺和近代文学的偏爱。周作人强调,要想了解日本文化,必须要从生活上去体验。在《留学的回忆》中,周作人提到了:“有些留学生过不惯日本生活,住在宿舍里要用桌椅,有人

买不起卧床,至于爬到壁橱上去睡觉,吃的也非热饭不可,这种人常为我们所笑,因为我们觉得不能吃苦何必出外,而且到日本来单学一点技术回去,结局也终是毛皮。”(《日本管窥》98 页)他在分析留学过日本的人,之所以对日本抱有好感的各种原因时,这样说道:“在相当时间与日本的生活和文化接触之后,大致都发生一种好感,分析起来仍不外是两种分子,即是对于前进的新社会之心折,与东洋民族的感情的联系,即上文所云明治维新与日俄战争影响的一面也。”(同上)而在谈到中国留日学生对于日本抱有恶感的原因时,他则这样解释:“可是如他回到本国来,见到有些事与他平素所有的日本印象不符的时候,那么他便敏捷的感到,比不知道日本的人更深的感觉不满,此其一。还有所谓支那通,追随英美的传教士以著书宣扬中国的恶德为事,于记述嫖赌鸦片之外,或摘取春秋列国以及三国志故事为资料,信口谩骂。不懂日文者不能知,或知之以为外国文人之所常,亦不敢怪,留学生则知日本国内不如此,对于西洋亦不如此,便不免心中不服,渐由小事而成为大问题,此其二。”(同上 99 页)

周作人基于东京生活及由此延伸的对于日本文化和日本文学的理解,其鲜明的特色就是着重于日本人生活的感觉以及对日本人情美的关注。从日本古典文学中的《古事记》、《徒然草》到狂言、落语(单口相声)、川柳(由 17 个假名组成的诙谐,讽刺短诗)、小唄(江户时代流行的短歌、小曲)、俗曲、俳谐(带滑稽趣味的和歌)、滑稽本(记录滑稽故事的书籍)等,他对于日本文学的理解,其出发点在依然是日本式纯朴简单的生活——即由清淡的日本料理、榻榻米、下駄(木屐)等元素构成的日本人的生活感觉。

周作人的日本研究三阶段

周作人集中论述日本及日本文化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自他从日本回国的 1911 年至 1924 年,这一段可以称作他的日本文学启蒙

时期,又可分为绍兴时期和文学革命时期两个阶段;第二个时期是从1925年至1929年,他在《语丝》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排日文章,也可称作他的日本批判时期;第三个时期是以1935年至1937年间写就的《日本管窥》等为主要内容的较正式系统的日本论时期。

对于日本文化的态度

周作人之所以对日本文化情有独钟,与他对日本文化所持的态度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他反对一般中国人轻视日本文化的态度,强调研究日本文化之重要。“大家都轻蔑日本文化,以为古代是模仿中国,现代是模仿西洋的,不值得一看。日本古今的文化诚然是取材于中国与西洋,却经过一番调剂,成为他自己的东西,正如罗马文明出于希腊而自成一家,所以我们尽可以说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艺术与生活方面更为显著,虽然没有什么哲学思想。我们除了把它当成一种民族文明去公平地研究之外,还当特别注意,因为他有许多地方是以供我们研究本国古今文化之参考。从实利这一点说来,日本文化也是中国人现今所不可忽略的一种研究。”(《谈虎集》315页)

而对于中国人对待日本文化的态度,周作人曾这样批评道:“中国人原有一种自大心,不很适宜于研究外国的文化,少数的人能够把它控制住,略为平心静气的观察,但是到了自尊心受了伤的时候,也就不能再冷静了。自大固然不好,自尊却是对的,别人也应当谅解他,但是日本对于中国这一点便很不经意。我并不以为别国污蔑我,我便不研究他的文化为报,我觉得在人情上讲来,一国的污蔑态度于别国人理解他的文化上面总是一个极大障害,虽然超绝情感纯粹为研究而研究的人或者也不是绝无。”(同上317~318页)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周作人在论及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关系时,常常将两者和希腊、罗马文化作比较。他在留学日本期间,曾学习过古希腊语,这也培养了他对希腊文化的兴趣。他之所以作这样的比较,